

20世纪前叶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的三重逻辑

刘国强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中国·北京 100048

摘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并在后续发展演变过程中出现多次重要理论转向与主题创新,因而其价值立场与研究主题往往呈现为一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外貌,尤其呈现出“从回避淡化重大政治经济问题到深耕于上层建筑领域”的理论特征;因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逻辑分析与澄清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一直以来的基础工作,这反过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价值倾向与问题意识的认识产生重要影响。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逻辑分析以往大都倾向于将其梳理为三种独立逻辑,即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历史逻辑,却疏于还原三种逻辑之间的联系。本文旨在以资本历史形态变化为主要抓手整合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历史逻辑,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以及“十月革命”的历史关系探寻其问题意识,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重大理论转向与主题创新进行分析尝试回应马克思主义“被动论”“过时论”“失败论”等误解。

关键词: 西方马克思主义; 理论转向; 三重逻辑; 资本形态; 实证主义

The Triple Logic of the Turn of Western Marxism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Liu Guoqiang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ina Beijing 100048

Abstract: Western Marxism emerged around the 1920s and, throughout its subsequent development, underwent multiple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shifts and thematic innovations. Consequently, its value stance and research topics often present a complex historical appearance, particularly demonstrating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 of "shifting from avoiding and downplaying maj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ssues to delving deeply into the realm of the superstructure." Therefore, logical analysis and clarific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Marxism have always been fundamental tasks in Western Marxist studies, which in turn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its theoretical themes, value orientations, and problem awareness. Previous logical analys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Marxism have tended to classify it into three independent logics—namely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logic, and historical logic—while neglecting the restoration of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se three logics. This paper aims to integrate the theoretical, practical, and historical logics of Western Marxism through the main lens of the historical forms of capital, and to explore its problem awarenes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Western Marxism and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as well as the "October Revolution." By analysing the major theoretical shifts and thematic innovations in Western Marxism around the 1930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respond to misconceptions of Marxism as "passive," "outdated," or "failed."

Keywords: Western marxism; Theoretical turn; Triple logic; Forms of capital; Positivism

0 引言

20世纪30年代西方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发生了明显转向,在理论内容上,对于政治经济领域的关注开始逐渐转移至“远离经济基础、位于等级制度最顶端的那些特殊的上层建筑层次……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在理论目的上,它开始由传统社会革命实践倾向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批判;二者共同作为后续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特征。相较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人们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与评价往往褒贬不一。在70年代前,佩里·安德森从实践逻辑角度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作“欧洲工人运动失败的被动产物”;埃里希·弗洛姆等人则主张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本主义”思想为根据,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主体性”的重视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理论逻辑的正当产物;卢卡奇则以“主体-客体辩证法”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转向理解为历史逻辑在理论层面上的合理展开。尽管三种逻辑在既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中各自不断完

善并且有力地解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与转向原因,但同时也引发了对于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与理论进程的种种误解。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进行澄清,既要作为其“前夜”的第二国际与十月革命的历史关系入手,又要以资本的历史形态为主导整合上述三重逻辑的内在关系,把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向的逻辑分析重新放入现实的人的历史当中去。

1 实践逻辑: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大陆的挫败与沉默转移

自20世纪20年代初起,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尚未完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恢复,纷纷因战争负债与货币超发等经济原因陷入通胀危机;与此同时,社会整体生产过剩与需求萎靡引发结构性危机,国内财政陷入“危机—赤字—紧缩—危机”的恶性循环。在此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生产领域自19世纪开始的“有组织化”与“自由市场”生产关系矛盾愈发紧张,最终走向1929年资本主义社会大萧条,自此西方国家逐步从自发的“有组织化的资本主义”走向“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开始从私人垄断集团走向国家资本主义,宣告西方国家政治权力与资本彻底融合。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凯恩斯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意大利、德国为代表的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与工人暴力革命运动当中走向法西斯主义应对内部危机——渴望恢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希望走出本国经济危机,将本国马克思主义者作为转移社会矛盾的攻击对象。同一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斯大林强行结束“新经济计划”,开始全面建设集体化计划经济。1924年后,共产国际推行“布尔什维克化”,要求各国党服从莫斯科的“列宁主义正统”,号召各国开展工人暴力革命,斯大林逐渐利用苏联社会主义影响力和国际资源,扩大对各国共产党严格组织控制与思想管制。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及实践活动在内外困顿的社会历史背景当中迅速陷入严重挫败。1923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因提出“总体性辩证法”和“阶级意识”理论,被共产国际斥为“黑格尔主义唯心论”;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对卢卡奇的批判达到顶峰。1930年至1944年,纳粹德国将马克思主义者列为“国家敌人”,卢卡奇被迫流亡苏联,其著作被禁,期间以个体撰稿人展开研究。1926年11月,葛兰西在意大利被法西斯法庭判处20年监禁,最终于1937年4月在罗马逝世。1923年,柯尔施发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对马克思主义

的实质及其发展提出了与列宁不同的见解,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公开敌意。1926年,因其反对德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柯尔施被开除出党,退出政治生涯和迁居他国。1928年,柯尔施退出政治活动,专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工作。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时陷入安德森所谓“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困境”当中。由于理论工作的缺位与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改革逐渐趋于稳定;同时期德奥匈意等欧洲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或惨遭失败,或受到共产国际管制、或遭受法西斯主义迫害,难以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发展做出实质性发展——同时期法国尚未诞生法国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唯有德国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成为这一时期欧洲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组织当唯一保持无产阶级立场、独立性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做出独特贡献的社会存在。

然而,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延续本身既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延续,也代表了其实践导向与实践逻辑的转变。1931年以“政治上不受怀疑的”霍克海默成为格律恩堡继任者为标志,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及其参与者的社会角色发生重大转变;这一时期,研究所参与者多为大学教授,以中立的理论研究立场主动远离共产主义运动与政党活动。相比于1920年前后对社会主义抱有绝对信念的德国知识分子,新一代德国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乃至社会主义抱有极大怀疑。随着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诞生,法兰克福研究所大部分成员沦为“流亡在欧洲社会的边缘群体”,最终迁移至美国,彻底失去对于欧洲社会的现实接触。

2 理论逻辑:革命主体的再寻、理论批判与人本主义的复兴

相比于格律恩堡时期,霍克海默自30年代开始对于社会研究所的规划始终意在利用“资产阶级”科学领域的现代发展将社会哲学与经验性的社会科学结合起来克服马克思主义效力危机;而其实践目的则是:使得欧洲“社会整体对个体更少任意性与不正当性,相应地人们也更少希望出现转变的规划”——“他希望……能够通过为这个世界带来意义和理性的方式服务于人类”。换句话说,20世纪30年代过后,当资本主义逐渐恢复生命力、无产阶级革命惨遭失败、无产阶级失去“革命主体”这一先验性身份的情况下,霍克海默仍然希望为欧洲现代文明危机开辟另一条“救赎”之路。在魏格豪斯的记叙中,青年霍克海默十分同情工人阶级与底层群众,“对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的愤慨一直是他最关注的内容”。但对于霍克海默来说,在其所处时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总体非人性的体验”与“对革命

的迫切需要”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底层群众“被压榨折磨得迟钝麻木，他们也意识不到这种不必要的悲惨达到了什么程度”，更不必提作为既得利益者的社会中上层群体；由此，社会失去确定了马克思主义所笃定的“革命主体”但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了卢卡奇与柯尔施在20年代初所提出的价值目的：“主动寻找革命主体”承担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

在目睹无产阶级惨败与资本主义日益强大后，霍克海默在面对“革命主体”问题时既不赞同草率参与革命行动，又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学院化转译，认为这是“一种打消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意志的尝试”，“代表全人类的知识分子们……讨论完了之后又充满怀疑地退回到现代的事务中去……维护着现有的体系”。因而霍克海默为自己确定了一个基本实践理念：对“现世事物的一切秩序”保持不满。由此入手，霍克海默重点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精神，展开对于现存理论的社会批判，他认为批判理论要从否定的方面理解现有的理论形态，指出它们不过是现存社会秩序的表现和补充。以霍克海默为代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内涵的实践理解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30年代开始真正出现主题转型创新的真正实践起点。

与霍克海默着手建立批判理论同期，《巴黎手稿》于1932年面世，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对《手稿》的思想作了种种解释，马尔库塞同年撰文提出《手稿》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基础是“人的本质及其实现”，他强调，若仅从经济或政治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而忽视《手稿》中的人本主义维度将导致理论贫乏化。霍克海默虽然并未直接撰文对其进行分析，但其《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等文章当中将异化概念从劳动领域延伸至文化、意识形态批判，认为资本主义的全面异化导致人的主体性丧失，这一思路明显存在与《手稿》中“人的类本质异化”观点的相似性。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虽于30年代末才加入研究所，但其早期著作已呼应学派对于《手稿》的解读，他甚至将《手稿》视为“马克思真正的代表作”，特别强调《手稿》中“人的自我异化”与“自由自觉的活动”等核心概念揭示了马克思哲学的人本主义内核。40年代后至今，不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讨论主题如何演变，其起源于20年代反对第二国际实证主义、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实践立场与《手稿》内在人本主义批判精神的继承，以及30年代内在批判精神的集体自觉共同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与人性的人道主义“异化”批判始作为其核心理论观

念得以延续，并且因此将《手稿》认作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核心与马克思的代表作。但真正从作为社会哲学社会批判理论拓展至资本主义社会多领域批判，尤其是文化（媒体、文学、美学等）领域的批判则必须引入同一时期，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内部的另一条逻辑线索——即波洛克与格罗斯曼所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对于以资本的历史形态把握为核心的历史逻辑。

3 历史逻辑：对于资本历史形态的片面把握

3.1 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研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波洛克既是一名经济学家，同时却也坚守对于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信仰。他在坚持经验研究的重要性、认定科学社会主义具有自然科学性质的同时，驳斥将唯物主义辩证法仅仅看作为“无产阶级历史形而上学”的组成部分的观点，以《反杜林论》为依据证明唯物辩证法的普遍有效性。

20世纪30年代初，针对魏玛共和国末期的经济大危机（1929年爆发），波洛克深入研究危机的结构性根源，批判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市场自我调节的迷信。他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的必然性，但同时警惕国家权力对资本的整合可能导致新的统治形式。流亡初期，波洛克重点研究纳粹德国的经济模式，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概念，认为纳粹体制同凯恩斯主义并无本质区别，同样是作为“垄断资本与国家机器的融合”——国家通过计划经济手段调控资本，但本质上服务于垄断资产阶级利益，而非实现社会公平。1941年，波洛克完成重要手稿《国家资本主义：其可能性和局限性》，系统对比纳粹德国、苏联与美国的经济体制，认为三者均通过不同形式的国家干预实现经济整合，但纳粹德国以军事扩张和种族压迫为特征，而苏联的计划经济则带有官僚集权色彩。他警告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中可能通过“国家化”走向极权，这一观点深刻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20世纪40年代后，波洛克转向对美国战时经济和战后资本主义趋势的研究，关注国家权力与垄断资本的新型结合（如军事工业复合体），并在《社会研究杂志》发表《论自动化的计划》（1947年），预见技术进步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冲击。

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研究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奠基的同时，却也延续了第二国际实证主义对于资本历史形态变化的片面把握。他片面却精准地从“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治权力”的历史性结合关系视角把握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变化与苏联社会主义

建设实验。“波洛克……发现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生存弹性,从根本上导致了批判理论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转向:当带有国家色彩的组织管理机制代替市场机制成为调节资本逻辑发展的有效机制……洞察到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向,使得波洛克对于扬弃资本在社会中的统御的可能性持有悲观的态度。……从此,不仅现实的政治实践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中处于集体失语状态,而且对以资本逻辑批判为主导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逐渐淡出了他们的理论视域之外。留下了诸如启蒙、异化、文化工业、新感性、单向度等带有浓重学院派的哲学概念和主题,它们构筑了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的全部重心所在。”“从突出实践的主体性到诉诸阶级意识,从强调意识形态领导权到倡导文化革命,‘西方马克思主义’就这样从革命的主体和对象、或革命的动力和任务趋向于否定现实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基础。”

3.2 “国际资本”历史形态的隐匿

自第二国际时期起,卢森堡所提出的“第三市场”理论——将国内垄断资本主义危机与国际资本殖民活动相结合理解资本主义的新的变化——昙花一现过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的历史形态变化的理解就仅仅局限于“民族国家视角”下对于国家权力与垄断资本形态的关系分析,最终成熟于波洛克1941年《国家资本主义:其可能性和局限性》一文;而对于“国际资本形态”的分析则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因20世纪20年代起至4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对于欧洲文明乃至资本主义文明危机历史逻辑的把握始终是残缺的,而对于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延续与演变的历史逻辑的把握也由此反观。1941年,在《国家资本主义:其可能性和局限性》一文中,波洛克是将三种主要的国家经济体制在“国家资本主义”视角下加以比较。但在这一视角下,波洛克却无法以此对于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危机做出完善的政治经济学解释,进而直接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来的领域转移与主题创新。

从历史逻辑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领域转移与主题创新本质上是“国际资本形态”与“垄断资本形态”的共同历史作用所决定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以生产逻辑为导向建立民族国家与资本的深度绑定,使资本以民族国家为载体,对内建立以资本增殖为根本目的的工业化社会组织关系,同时对外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展开以超额利润为目的的殖民掠夺活动,二者一体两面;一旦后者由于历史必然的各个国家发展程度不均而出现国家冲突将直接导

致保守主义、保护主义与地域冲突,弱势国家由于缺乏足够的殖民地市场与国内市场,必然出现经济危机乃至社会危机,最终出现政治强权与极权化倾向。以美国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借助庞大的国际市场、国内市场,坐拥丰富的殖民资本储量致使其国内资本与国家权力的结合能够跨越分配关系危机引发的社会危机并导向地整合社会内部关系;因而当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对基本完成转型的“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时,单纯从“国家资本视角”是难以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角度窥视其真正秘密的,从而致使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转移至美国面对刚刚恢复胜利的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社会时彻底失去政治经济学批判信念,转向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乃至心理学批判。

4 结语

以历史逻辑为现实根基,以理论逻辑为内在表征,以实践逻辑为外在载体,如此完成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第二国际破产至二战前所处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所发生的主题创新与领域转移的完整逻辑分析。首先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主题创新发展与问题领域的转移,虽然有其工人运动失败所引发的种种重要原因,但并不足以致使其发生定向转移。绝不能忽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理论逻辑与价值立场倾向——甚至其理论逻辑与立场倾向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三位创始人集体转向文化、意识、主体问题;因而单纯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国际工人运动失败产物的“失败论”“被动论”未免过于片面。另一方面,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主题创新发展与问题领域的转移的理解不能单从其人道主义传统与欧洲唯心主义传统来理解其内在可能性,而必须引入政治经济学对资本历史形态变化的分析成果来从历史逻辑角度理解其转向的历史必然性——否则便会陷入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结论;最终,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本身的理解,不仅应当重视来自第二国际实证主义的思想遗产与理论阴影的刺激与影响,更应该结合十月革命以及列宁在《左派的“幼稚病”》一文中基于唯物主义辩证法展开的批判综合理解,否则难以把握实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的复杂影响。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 [2] 列宁. 列宁全集:第2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

[3] 列宁. 列宁全集: 第39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4] 伯恩斯坦. 伯恩斯坦文选[M]. 殷叙彝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5] 考茨基. 考茨基文选[M]. 王学东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6] 弗兰尼茨基. 马克思主义史: 第一卷[M]. 胡文建等译,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7] 罗莎·卢森堡. 资本积累论[M]. 彭尘舜、吴纪先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1959.

[8] 葛兰西. 实践哲学[M]. 徐崇温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0.

[9] 葛兰西. 葛兰西文选 1916-1935 [M]. 国际共运史研究所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

[10] 葛兰西. 狱中札记[M]. 曹雷雨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11] 奥托·鲍威尔. 鲍威尔文选[M]. 殷叙彝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12]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杜章智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13] 佩里·安德森. 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 高锴等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14] 马克思·霍克海默. 批判理论[M]. 李小兵等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9.

[15] 罗尔夫·魏格豪斯. 法兰克福学派: 历史、理论与政治影响[M]. 孟登迎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16] 戴维·麦克莱伦. 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第三版)[M]. 李智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17] 张一兵, 胡大平.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8] 李乾坤编. 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文选[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5.

[19] 任皑. 民主社会主义与新康德主义[J]. 安徽大学学报, 1992,(01):24-28.

[20] 陈明. 新康德主义哲学新探[J]. 海南师院学报, 1994,(02):14-17.1994.02.004.

[21] 于营. 怎样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现”和“改造”[J]. 理论前沿, 2009,(06):24-26.

[22] 王浩斌. 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历史逻辑——以市民社会为核心的考察[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0,(02):135-141.

[23] 王南湜. 改变世界的哲学何以可能(上)——从马克思到后马克思主义[J]. 学术月刊, 2012,44(01):36-49.

[24] 陈学明. 20世纪初西方三大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先后问世与相互角逐[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10(03):21-31.

[25] 申一青, 许恒兵.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反思与批判[J].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15(06):122-125.

[26] 杨得雨. 论第二国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分化影响[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2016,(07):62-63.

[27] 许文星. 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脉络分析[J]. 社科纵横, 2017,32(02):135-137.

[28] 唐永, 郭瑾晖, 张婷.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内涵及当代评析——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例[J]. 甘肃理论学刊, 2017,(06):66-71.

[29] 陈琳. 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特点和影响[J]. 科幻画报, 2019,(02):184+186.

[30] 王雨辰.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逻辑及当代价值[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1,(04):95-103+204.

[31] 迈克·泰伯, 张文成. 第二国际与社会主义[J]. 国外理论动态, 2023,(03):102-109.

[32] 夏莹.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嬗变及其核心问题意识[J]. 浙江社会科学, 2024,(01):102-115+159.

[33] 黄其洪.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期发展[J]. 社会科学辑刊, 2025,(02):13-22+2+243.

[34] 陈子祺, 孟飞. 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的历史贡献、思想分化和当代启示[J]. 深圳社会科学, 2025,8(03):30-39.

[35] 任皑. 民主社会主义与新康德主义[J]. 安徽大学学报, 1992,(01):24-28.

[36] 祝黄河, 张云英. 历史合力论: 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内在一致性[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2,8(05):67-77.

[37] 田鹏颖, 姜耀东. 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捍卫与发展——基于恩格斯晚年五封书信[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9,(10):87-94.

[38] 朱思远, 王传利. 准确理解恩格斯的革命策略思想——兼驳对暴力革命一般规律性的质疑[J].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024,10(03):78-89.

作者简介: 刘国强(1999-), 男, 在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与意识形态理论。